

白朗起义

杨炳延



258.3

白朗起义

杨炳廷

河南人民出版社

白 朗 起 义

杨 炳 延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 州 二 七 印 刷 厂 印 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05·11 定价0.12元

目 录

一、“袄片” “笨炮” 根深源远·····	(1)
二、志坚胆壮 “打富济贫” ·····	(6)
三、东征西战 协同讨袁·····	(14)
四、独抗大敌 巍然挺立·····	(22)
五、横扫陕甘 威震敌胆·····	(32)
六、血沃中原 浩气长存·····	(41)
附 记·····	(48)

一 “袄片”“笨炮” 根深源远

一九一一年（夏历辛亥年）秋天，一场人民革命的大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为了推翻当时中国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这一年的十月十日，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末日的来临。

就在这个重要时刻，在河南宝丰县一个叫做姚店铺的小村子里，贫苦农民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待着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粗看起来显得很“不壮观”：人数很少，只有二三十人；装备很差，只有“笨炮”（用火药发射铅弹的土铳）和钢刀；衣衫褴褛，战士们只有一件破袄片勉强蔽体。这支队伍没有名号，人们就根据它外表上的特点，称它为“袄片队”或“笨炮队”。

在这支小小的队伍中，人们注意到一个三十九岁的壮汉，被战士们亲切地呼为“官大哥”（大伙的大哥）。看他，身高五尺挂零，膀大腰圆，显得十分魁梧；略带圆形的脸膛，黑中透亮，浓黑的双眉下面，配上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显得奕奕照人；声音洪亮，与乡亲们谈话时慢条斯理地，显得十分和蔼可亲。

他，姓白名朗（1873—1914年），字明心，小名六儿，汉族，宝丰县西南二十八里处的大刘村人。这支小小的队伍就是他投身绿林拉队伍造反后最初聚集起来的穷哥儿们。

在宝丰和邻近的鲁山一带，除去白朗率领的这支“袄片队”外，同时活跃着多支类似的农民武装。较著名的有杜启斌、郜雪成（秦椒红）、牛天祥、郭以德、董万川、张黑子等部。同白朗部一样，参加的主要是本地的贫苦农民；另外还有一批挖煤工人和制陶工人。他们拿起“笨炮”、大刀、长矛和少数五响快枪，往来于宝、鲁地区的乡村集镇，与地主豪绅展开斗争。活动方式，开始是“索银子”（队伍隐散于村外，高声喊叫，指名强令某某地主老财在限期内送相当数量的银子到某一指定地点，否则就予以严厉惩办）、“起肉票”（绑架地主老财或其家属，限期交银取赎）；后来就进而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公开地突袭村庄集镇，打开地主老财的仓库，没收其浮财，把钱、粮分散给穷人。当时，除了县城及其近郊外，四境各乡几乎都是这些小股农民武装的活动天地。

本来，白朗的父亲白真在世时，其家还有些田产，白朗从小就在家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在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家境每况愈下，青壮年时期的白朗只好以赶牛车（拉盐）和开炉场（冶铁）来弥补一家人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往来各地，与各方面的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蓬勃的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运动的推动下，白朗的心胸中也燃起了革命的烈火，广泛地结交了本地区的绿林豪杰。一九〇八年，白朗不

甘本村地主的欺压，怒毆了一个名叫王真的地主，被反动官府捕捉入狱。反动县官和地主豪绅借此对白朗一家肆意敲诈勒索，白朗本人还不止一次地遭到吊打侮辱，更激起了这个壮年农民对反动统治的满腔仇恨。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宝、鲁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旱灾和雹灾，春、秋两季很少收成，阶级矛盾愈益激化，农民反抗武装愈来愈多。就在这个时候，牛天祥率领的一股农民武装攻下了宝丰西乡的大营村，特意派人给白朗送来一支“笨炮”。不久以后，白朗就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宝、鲁地区人民武装反抗斗争的行列。由于他长期以来就深受劳动群众的爱戴，而且见多识广，勇敢坚定，所以很快就有一批破产农民团聚在他周围，成了本地区一位著名的绿林英雄。

一九一〇年，北京朝廷里有一个名叫陈善同的河南籍官僚，向清朝皇帝奏报说：河南境内“贫者率流于盗，千百成群，昌言不讳”，有些地方，“几乎无人不匪”。它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各州县贫苦人民都奋起造反，小股的农民武装有如繁星一样布满中州大地，宝、鲁地区只是全省的一个缩影。

清王朝一直严密控制的河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形成这样蓬勃的革命形势，是与这个时期河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河南人民在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清王朝为了加强其反动统治和适应帝国主义洋主子的需要，更不惜竭泽而渔，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

光是田赋一项，就“一两而收数两”，比过去增加几倍；其他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老百姓记都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小至一只鸡、几尾鱼、一担粪、一辆车，都须交捐纳税。各级反动官吏及其爪牙狗腿又肆无忌惮地进行额外的敲诈勒索，人民的实际负担普遍比过去增加几倍以至十几倍，连反动官僚也承认是“百弊丛生”，“为各省之冠”。地主豪绅又火上加油，榨干农民最后一点血汗。以宝、鲁地区为例，当时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都被地主阶级所霸占。农民除了被迫交出劳动成果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作为地租外，还要向地主送礼和服无偿劳役。高利贷也十分猖獗，起码是“银三粟五”，即贷银一月，利息百分之三十，借粮一季，加息百分之五十。所谓“大户吃粮，小户吃场”（吃场，即场上无粮的意思），贫苦农民在场光地净、交租还债以后，就两手空空，家无一粒粮，只好用榆树皮、杂草、滑石粉、椿头菜、槐叶、柳叶等苟延性命。至于煤窑工人和烧陶工人，生活也一样艰苦万分，一天十二小时的牛马活，所得工资只够本人勉强果腹，老少一家常年是“瓢不动，锅不响，肚子饿得贴脊梁”。因此，即使平常年景，也有许多人被迫外出逃荒，有的村庄，除去一两户地主富农外，几乎都曾去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要过饭。真是“打不尽毡上的土，诉不完穷人的苦！”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

^①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横排本，第588页。

富有革命传统的河南人民，怀着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深仇大恨，长期以来，就此伏彼起，拿起武器，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勇猛的冲击。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各种形式的农民武装更如雨后春笋，在大河南北遍地崛起，往往一县就有数十股。虽然一般规模都还很小，但却十分活跃，有的直截了当地提出“均产”的口号，有的发贴布告，号召贫苦人民前来分取地主富人的财产。清朝反动统治在广大农村中实际上已陷于半瘫痪状态。活跃在宝、鲁地区的白朗等部农民武装，就是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当时河南以至全国人民革命高潮的组成部分。

二 志坚胆壮 “打富济贫”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取了全部革命果实，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他适应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需要，猖狂地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复辟封建帝制。他派其表弟张镇芳充当河南都督（民国初年统管一省军政大权的官职），对河南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榨取，甚至母鸡生下一个鸡蛋，都要逼交“蛋捐”。因此，河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不仅没有获得丝毫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反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据当时记载，省内各县人民都是“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妇劝其夫”，从四面八方参加各种起义行列；敢于反抗的，“父老夸其能”，犹豫却步的，“妻室恨其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宝、鲁地区活动的白朗起义军，就很快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横排本，第528页。

一九一二年四月，民愤很大的宝丰县知事张礼堂（外号“张糊涂”）卸任了，准备席卷搜刮来的人民血汗，滚回省城开封。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很担心当地人民不放他过去。反动官府和地主豪绅历来是狼狈为奸的。张礼堂经过一番盘算，决定求助于宝丰城西南杨庄的大地主杨小端。杨小端收下张赃官的厚礼后，就写信给杜启斌，连骗带吓，要杜维护张礼堂的途中安全。杜启斌虽是当时宝、鲁地区最大的农民武装的头头，但他出身剥削阶级，想仿效《水浒》中的宋江，把参加绿林造反作为当官的门径。在接到杨小端的信后，他违背其他几个首领的意愿，居然满口答应。其他几支农民武装的头头，顾惜与杜启斌的关系，也只好按兵不动。张礼堂和杨小端自以为一切已安排定当，可以满有把握地回省城享用民脂民膏了。

可是，白朗那支“袄片队”却偏偏对贪官和豪绅不讲“交情”。白朗在探悉了张礼堂动身的日期后，就与战士们商定了行动方案，决心单独给张礼堂以应得的惩罚。

张礼堂离开宝丰的那一天，杨小端派出十几名武装保镖护送。几辆满载着赃物的大车和张礼堂及其眷属的座车刚走到宝丰城东北的交马岭，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预伏在那里的白朗和二三十个战士跃上大路。张礼堂情知中伏，赶忙扔下财物，舍命逃奔，十几名武装保镖也吓得乖乖地举起双手。白朗军缴获了十几支快枪和贪官的赃款，并扣留张礼堂的次子作为人质，带回姚店铺。张礼堂被迫又送来十几支快枪，换回了他的儿子。这一仗不仅大长了穷哥儿们的志气，

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而且使义军获得了二十多支快枪。

“笨炮队”得此利器，如虎添翼，实力便更加快速地扩充起来。

在此期间，秦椒红的队伍以鲁山城北的梁洼为据点，也开展频繁的活动。于是白朗就带着队伍，移驻宝丰城西的老饭店，与东南面的梁洼互为犄角。宝丰、鲁山两县的县知事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叶县县知事温少良升官心切，不自量力地自吹要“包打鲁山土匪”。他纠合了四五百反动武装，西犯梁洼。白朗、秦椒红两支队伍并肩作战，在半途主动伏击，打得反动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逃入鲁山城。随后联合鲁山的反动武装共同进犯，又被白朗等杀得丢盔卸甲。白朗和秦椒红乘胜进军，直抵鲁山城下。城内的反动武装只能勉强招架。宝丰的反动武装也闻风丧胆，急电开封向张镇芳告急。义军终因力量有限，不久就撤离鲁山城郊。

“剿抚兼施”，即交替施用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骗的反革命两手，是历来反动派破坏人民革命的惯用伎俩。早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张镇芳就曾选派人员前来鲁山一带，“招抚”零星崛起的农民武装，但是未能得逞。这时，河南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毓秀因无力镇压各股农民武装，就秉承张镇芳的旨意，接受其管带（相当于营长）袁正邦的建议，并取得河南军政司长（相当于河南都督的参谋长）王丕焕的同意，决定以“招安”为名，诱杀宝丰、鲁山一带农民武装的首领。他们让宝丰大地主杨小端出面，劝说和他有“交情”的头头杜启斌等向反动官府投降，换取一官半职。本来就别具肺腑的杜启斌果然上钩，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带同十七名头头

进入鲁山城“受抚”。

白朗军在撤离鲁山后，仍旧移扎宝丰正西的老饭店。一天，反动官府派人来白朗军中，要白朗也仿效杜启斌等投降当官。同杜启斌等股比较起来，白朗起义较晚，所部人数少，装备差。但是，“虎瘦雄心在，人穷志不穷。”五六十名壮士紧密地团结在白朗周围，斗志十分高昂。当反动官府的差人向白朗提出“招抚”的鬼主意时，白朗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还想骗老子哩！”命令来人立即滚蛋。随即与战士们分析形势，知道反动官府“收抚”了杜启斌等股以后，必将全力扑犯坚强不屈的白朗军。白朗当机立断，率领全队向东北穿过郟县城西北地区，进达禹县城西南的神垕，并在神垕稍事休息后，又南下舞阳及其以南地区，使反动派“吃掉”这支起义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事实很快告诉人们，向反动官府投降会有什么结局。当杜启斌等一进入鲁山县城，立即就被反动官府监禁起来，不久，全遭枪杀。他们的部众本来就不愿归反动军队“收编”，这时就纷纷携带武器聚集到白朗的大旗下面来。白朗军在粉碎了反动官府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骗的同时，队伍扩大了十倍，达到五六百人，成为本地区最强大的农民武装。

但是，白朗清楚地知道，单凭这五六百人的队伍，是难以与当时压在人民头上的北洋军阀的军事机器长期对抗的。摆在义军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利用有利的形势，迅速扩大革命力量，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当时整个河南，社会矛盾愈益激化，广大农民与地主豪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已进入短兵相接阶段。特别是邻近湖北、安徽、陕西的边境州县，类似白朗早期的“袄片队”的农民小股武装遍地蜂起。城乡的地主豪绅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也纷纷招集流氓地痞，成立不同规模的地主武装（当时称“小队”）。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军事统一”，强迫各省解散辛亥革命时期编集的民军。因为土地都被地主豪绅所霸占，许多士兵“解甲”而不能“归田”，纷纷加入到反抗队伍的行列。这样，当时广大农村就到处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群众武装，给白朗领导的义军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为了广泛吸收各地武装反抗的农民和退伍士兵，为了消灭分散的地主“小分队”，收缴他们的枪支，白朗就决定避开反动势力比较集中的城市，在广大农村中往来回旋，力争在战斗中尽快地壮大自己，然后再与北洋军阀一决雌雄。

基于这样的正确决策，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五月，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白朗率领全军避开反动军队的主力，在舞阳以南几个县的农村集镇中穿插流动。他们先由舞阳南部的山地转向东南，突入西平城西南的出山寨；再转向西南，袭击舞阳西南部的王店；然后继续南下，进入泌阳北部的象河关、春水；再折向西北，围攻方城东北的独树。与此同时，还派出小部队东进到确山城西，登上邓庄以北的大乐山进行侦察。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只在独树周围遭到护理（代理）南阳镇总兵田作霖的顽抗；其他几个地方，基本上畅行无阻，或者只遇到微弱的抵抗。随后又从方城的独树向东，撤到舞阳南部山地略作休息，又南下泌阳，向东南

挺进。

白朗军所到之处，都无例外地宣传“打富济贫”的口号。对于长期吮吸人民膏血的地主豪绅和富商，白朗军毫不留情，打开他们的仓库、当铺、钱庄之类，除留下一部分充军用外，把大批的银钱、衣服、首饰、粮食及其他什物，搬到大街上，让战士们四处呼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因此，白朗军打开一地以后，地主老财们纷纷如鸟兽散，而贫苦人民却象赶会一样，男女老少齐出动，背的背，装的装，欢庆被地主老财夺去的劳动成果部分地回到自己手里。同时，白朗又在部队中三令五申，严禁对群众“打孽”（即借机报私仇，对地主官僚不在此限），严禁奸淫。犯禁者，不管是“杆首”（即各支武装造反队伍的首领），还是战士，随即正法，毫不宽贷。作为全军首脑的白朗率先示范，作风十分严正，真正做到一尘不染。平时他对战士们总是和蔼可亲，但如果看到有人对着妇女嗤鼻弄眼，他就会当面加以训斥。他还经常告诫部队：不管到哪里，老百姓做啥饭咱吃啥饭，不准要这吃要那吃。因此，行军所至，对贫苦人民秋毫无犯。贫苦人民看惯听熟各支“官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因此，对爱护人民的白朗军就非常拥护。许多城镇的贫苦人民在白朗军到来时，都在大道上摆上“贺桌”（将酒肉果品摆置桌上，表示庆贺之意）；有的还打起花脸、穿上戏装、载歌载舞地迎接白朗军。许多壮年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都纷纷告别乡亲，加入义军的行列。半年之内，白朗军又扩大了四五倍，达两三千人。他们不断“吃掉”各乡的地主“小队”，收缴

其枪支武装自己，声威震动远近。

如果说，早期白朗军因为人数和活动地区有限，北洋军阀政府还不十分重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能不认真想一想了。当时，在河南信阳一带驻屯着袁世凯的一支嫡系部队——李纯统带的北洋陆军第六镇(师)，号称“精锐”。白朗军由泌阳向东南挺进的情报送到第六镇后，李纯急派手下一个叫张敬尧的团长率军由确山向西拦截。这是白朗军第一次与北洋正规部队的正面较量。为了让气焰嚣张的北洋军尝尝起义军的厉害，白朗选中了泌阳东北的小铜山，派部队预先埋伏在那里。当张敬尧率领喽罗们摇摇晃晃地从山下经过时，信号枪一响，白朗军居高临下，向着挤作一团的北洋军猛烈开火。贪财而又惜命的敌人弄不清虚实，慌忙扔下枪支弹药，甚至把他们劫掠得来的大量银元也丢在大路上，徒手轻身逃跑。赫赫有名的北洋军不过是“马屎面上光，剥开肚里一包糠”，除了给白朗军充当“运输大队”、提供许多新式武器外，没能阻挡白朗军一步。

白朗军在打败张敬尧以后，就继续向南，进入桐柏山区，第一次跨出河南省境。河南都督张镇芳急电袁世凯政府的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派兵堵截。当白朗率队进抵湖北随县北部山区的天河口时，湖北陆军第三师王安澜部驻随县的一个团赶来迎击。这些“鸡蛋兵”抵不住白朗部众的白刃冲杀，仓惶溃败，团长和几个连、排长都被打伤。消息上报到北京，正在大做皇帝梦的大总统袁世凯更加吃惊。他赶忙电令湖北、河南两省赶调反动军队，合力“兜剿”，以免影响帝制丑剧

的演出。

但是，正当湖北的黎元洪忙于调兵遣将之际，白朗却又带领队伍北返河南，从西北方向指向唐河（当时称唐县）了。